

MinGuo
NaXieDaShi

张军 著

民國那些
大
師

清華園

K825.46/24

2008

张军 著

民國那些 大師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那些大师/张军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 978 - 7 - 216 - 05400 - 3

- I. 民…
- II. 张…
- III. 高等学校—教授—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931 号

民国那些大师

张 军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嘉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5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字数:314 千字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1 - 5 000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400 - 3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5
插页:4
印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引子

今天的大学，门大了，楼高了，学生多了，校园大了，总之是越来越大了，你走到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所大学都会给你留下如此宏伟壮观的印象。

然而，你眼神里要寻找的，你心目中所渴望的——比如那些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大师，却似乎像秋后的树叶一样，日见其少了，那些滋润心灵，养育良知和道德的人文精神，也似乎像当下村庄中的炊烟一样，越来越稀薄了。

像置身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在心底还留恋着乡村的古朴恬静那样，站在今天校园里的我们，也不免怀想六十多年前大学里的那些大师，以及发生在那些大师身上的那些事。虽然只是几十年的光景，但物换星移，沧海桑田，那些人，那些事，竟如把玩一件件古玉一样，恍若梦里在和历史交流、对谈，那么温润，那么亲切，那么值得让人留恋深思。

……

目 录

- 那个时代·那些大师(代序) /1
- 金岳霖:赤子其心,渊深其学 /10
- 梁漱溟:文化神州系一身 /18
- 刘文典:不得中行,必也狷狂 /29
- 熊十力:不依不傍,独立不苟 /34
- 把大师请进校园 /44
- 让教授拥有话语权 /57
- 心忧天下事,不废读书声 /71
- 孔子、老子与鬼子 /81
- 校门不向衙门开 /87
- 从乡村教师到儒学大师 /94
- 胡适:宁鸣而生,不默而死 /100
- 同路歧声 /112
- 怎一个“严”字了得 /126

大节与小节 /131

大作家与小教材 /142

像行云一样自由地教,像布雨一样严密地考 /145

书生报国笔如刀 /158

自古淹博勤中来 /167

我本有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177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191

高要求与高待遇 /204

一流大学是怎样建成的 /216

后 记 /234

那个时代·那些大师(代序)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充满着动荡、杀戮和苦难，也充满着流亡、变革和奋争，弥漫着绝望，也充盈着希望。就思想界、学术界而言，那是一个新学和旧学碰撞，中学和西学融汇的混沌时代，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群星辉耀的璀璨时代，就职于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便是这个星群里的最闪亮的“明星”！在他们的身上，你能清晰地看到传统士人的言行操守，也能迎面感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他们接续历史，又瞻望未来；他们吸吮于诗书，洗礼于五四，养成于西学，以讲台为阵地，以书刊为舞台，或孜孜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造，或倡言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除了周作人等极少“异数”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无一不是希图在政治昏暗、外患频仍、传统断裂的现实中探求民族自由、文化重光、国民新生的道路和方法，无一不是希图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在大学这块“净土”上去构造个人的立命之所，社会的精神家园；他们在黑暗中喊出的民主和科学，至今仍是我们尚须努力奋斗的命题，他们在穷愁困厄、颠沛流离中坚守的为人品格和为学范式，至今仍是值得我们景仰、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尽管这其中的许许多多，因种种原因我们难以企及，更谈不上超越他们，但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总是可以做到的。

哲人其萎，风范犹存。

有鉴于此，我从众多民国教授中撷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部分人物加以述评，以期给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教育者和管理者以思考和启迪。我想，如下几点是我想着力通过他们传达给读者诸君的：

一是他们融贯中西的深厚学养

民国时期的教授大多从前清走来,不少人如丁文江、翁文灏、马叙伦等还获得过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功名,他们幼承庭训,童蒙习经,从小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虽然那些塾师所讲的,自己念读的,“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①但国学根基、传统道德、伦理节操却如种子一样布进了他们的心田,终生都在滋养着他们。及至稍长成人,他们中的多数又放洋留学,接受西方现代知识、科学方法、民主观念的教育和熏陶。两种文明的养育,最终使他们能够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以西洋方法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文化吸纳西洋新知,出入东西,参证中外,成为既“专”又“通”的大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一生颠危,终日蹇涩,外侮内忧,社会凋敝的情况下,仍能作出卓绝千古的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先天”原因。

二是他们求真求实的治学风范

学术是亘万古,横九亥之事,容不得半点虚伪和马虎,也容不得任何的趋时择利,曲学阿世,这就是那个时代学人心照不宣,自觉坚守的学术气节和道德操守。

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总结出的治学原则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成了他一生为学的格言,他后来将这两句话连同“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常常写成条幅送人,以引导更多的人去“小心”治学,认真做人。

胡适是那个时代的学界领袖,他的风范即是彼时学者治学态度的代表。

语言学家罗常培写文章从来就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他到滇西鸡足山考察时,见到一部丽江木土司的《木氏宦谱图家世系考》的书,回来整理后,写成了《论鸡足山悉擅寺的木氏宦谱》一文,发现了藏緬族的“父子连名”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但手头资料不够,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敢成文。直到后来他又数次深入滇西,找足了相关文献之后,才写就了《论藏緬族的父子连名制》及“再论”、“三论”这一现象的文章,充分论证了人类学史上的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也回答

^①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见《傅斯年全集》第七册。

了南诏国非傣族建立这一历史疑难问题。

另一位语言学家魏建功曾参与刘半农先生主编的《十韵汇编》的编撰工作。1938年,为向母校北京大学40周年校庆献礼,他拟收集资料,再作分析,编成《廿韵比》,可终因尚缺一韵而未果。10年后,这方面的资料仍未收齐,他最后只是撰成《十韵汇编资料补并释》出版,算是献给母校50周年庆典的礼品,《廿韵比》一事,他至死都没有苟且为之。

陈寅恪的渊博深不可测,享誉中外,然而他总是以“知之为知之”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问。如其文中涉及其钻研不精之处,他或写道:“寅恪于音韵之学,无所通解,故不敢妄说”^①;或注明“寅恪于训诂之学,无所通解,不敢妄说”^②,以求真存实,甚至为廓清《魏书·释老志》中提及的“种民”一词,他竟费时数十年,直到完全弄懂后方才下笔。这份严谨和认真,不知今日的高产作者们有何种感想?

学问之道,还在于沉潜执着于自己的追求,保有不为外界所移的笃定心志。西南联大时期,抗战方炽,物价腾涨,教授们的生活捉襟见肘,时见饥寒。汤用彤教授一度只能喝粥度日;冯友兰教授则靠夫人炸麻花聊补家用;就连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家里,也出现了不敷之窘,其夫人有时只好摆地摊,变卖儿女们孩童时的衣物换钱买米。但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中,他们奉献的学术成果却是坚实而丰硕的,仅以1942—1944年获教育部嘉奖的为例即有:

1942年:冯友兰《新理学》、华罗庚《堆垒素数论》、金岳霖《论道》、许宝禄《数理统计论文集》;

1943年:周培源《湍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钟开莱《概率论与数论》、孙云铸《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李谟炽《公路研究》、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张印堂《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冯景兰《川滇铜矿纪要》、费孝通《禄村农田》;

1944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楚辞校补》、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张青莲《重水之研究》、赵九章《大气天气之涡旋运动》、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高年华《昆明核桃等村土语研究》、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阴法鲁《先汉乐律初探》等^③。

他们以传统士人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于家贫国难之中挺起了民族的学术脊梁。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稿》,第342页。

②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1页。

③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521,527—528,534页。

三是他们奖掖后进的海人精神

民国时期的教授,受业于塾师,学成于海外,和其前辈业师相比,他们所受的教育背景,所处的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因而他们与学生之间,既不乏传统私塾里的师徒情谊,亦存在现代大学中的为国育才的新型关系。他们的身上,在肩负着传道授业的责任的同时,还多了一种世界眼光和社会意识。

浣水人徐复观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唐君毅、牟宗三号为哲学大师熊十力的三大弟子,他是1943年左右因看到《新唯识论》而产生敬佩之情,进而开始与熊十力交往的。徐复观当时官至少将,国学根底也自以为了得,便以就教的态度给熊十力去了一信。几十年后,徐复观回忆说:“不几天,居然接到回信,粗纸浓墨,旁边加上红黑两色的圈点,说完收到我的信后,接着是‘子有志于学乎,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两句,开陈了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再说到后生对于前辈应当有的礼貌,责我文字潦草,诚敬之意不足,要我特别注意。这封信所给我的启发与感动,超过了《新唯识论》。因为句句坚实凝重,在率直的语气中,含有磁性的吸引力。”^①

后来,熊十力要徐复观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读完后便再次去拜见熊十力。熊十力问他有何心得,徐复观便说了他许多不同意的地方,孰料熊十力未等徐复观说完即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骂,骂得我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脑筋里乱转着: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一部的意义!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②确实,经过这起死回生的一骂,徐复观从此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读书态度,他已由浮躁转向沉潜,由20年前对中国文化的厌弃转向热爱、检讨和反思,并进而在日后的研究中开辟出了儒学的一种新境界。

①②徐复观:《我的读书生活》与《有关熊十力先生的片鳞只爪》,《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315、345页。转见自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8页。

胡适则始终以春风拂面的温暖给学生以关爱和帮助。他当北大校长期间,不少要到美国留学进修的学生因无法提供 2000 美元的保证金而难以成行。胡适得知后,便从自己的存款中取出钱来贷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

这种惠人之举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它超越了阶级、立场和时代的局限,体现的恰恰是为师者的永恒的烛光品格和博大襟怀。

四是他们开放宽容的治校态度

民国时期的大学普遍奉行“教授治校”制度,教授评议会在教授的聘请、辞退、评定和其他教学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校长本身就是教授出身,有的还兼着教学任务,因而校长的决策甚至就是教授们意见的代言,相反地,得不到教授们的认可,校长们的决策不仅难以施行,校长们的职位恐怕也难保,梅贻琦前的清华大学十换校长,大多因校长与教授的矛盾而引起。

蔡元培常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部的机关。”在他的倡导之下,北大校园里中西文化兼收并蓄,新旧思想和而不同,教授们的学术观点缤纷万象,蔚为大观。

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两人同开一课,各申其说;黄侃和钱玄同,一讲汉字二十八部韵,一讲废除汉字,两人课堂上互相批评,课后却作揖言好;钱穆终生反对白话,但他进北大,却是受倡言白话的胡适之聘……讲课的如此,求学的也是如此。到北大听课的,除了招收的正式学生外,还有注册的旁听生、选科生,更有未办任何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致使有的课堂,临到考试时才知道,听课的全是旁听的;选课的,还有的不是因为同意老师的观点,而是来看老师如何“荒谬”的。

北大的学风、教风也影响着其他高校的校风。罗家伦毕业于北大,他当清华大学校长时,这位国民党陆军少将因试图将党化教育搬进校园而遭师生的抵制。但他在聘任教授时,却不论资历党派,只问

学术水平;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他当武汉大学校长时,法学院教授范寿康大讲唯物史观,“最受进步同学欢迎。”^①

由此也不难看出,为什么那时候政治黑暗经济萧条,大学却是鸟飞鱼跃、思想勃发,为什么那时候烽火连天、战乱频频,大学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精英,国家栋梁?开放让大学成为“大学”,宽容让大学成为“博”学,这应该是大学精神的题中之义吧。

五是他们独立不阿的人生品格

作为学人,应该具备怎样的人生品格?

王国维沉湖之后,知交陈寅恪为其纪念碑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感三光而永光。”其实他在写王国维又何尝不是在夫子自道?1941年,他应邀赴欧洲讲学,由昆明经香港时,遇太平洋战事而滞留香港大学。日方和汉奸陈璧君得悉后,都来逼他投敌,日伪组织还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制定中小学教科书,他高声怒斥,一概严词拒绝!须知那时的他,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拿不出来!

这同熊十力两次辞绝蒋介石的百万拨款,闻一多治印养家,却坚拒贪官权贵的重金所求一样,让人看到的是学人的独立不苟、凛凛傲骨!

面对金钱时,他们能清贫自持,非分不取,面对丑恶和腐败时,他们更能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这又是一种比金子更可贵的品格。闻一多明知特务的枪口已对准了他,却毅然表示“我前脚跨出去,就不准备后脚迈进来!”这是何等的大义大勇!傅斯年面对孔祥熙、宋子文之流的贪污腐化,屡屡上书予以揭露,著文予以抨击,终于迫使蒋介石撤了他的这两位姻亲之职方才罢手。这种嫉恶如仇,奋不顾身、独立不阿的精神和魄力,闪耀的不正是公众期冀知识分子所应承载的社会良知和正义?!

^①李锐:《“一二·九”运动前后在武汉》,载于《“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回忆师友的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他的师友们的做人原则,在谈到他的老师潘光旦时,说:“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

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这个问题存在。”笔者要说，我们下一代还可以体会得到吗？体会不到，又怎么可以做到？再下一代呢？

抗战胜利，陈寅恪几近盲瞽，想到国家多难，个人多病，这位高标自持、耿介不阿的大师写诗慨叹道：“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其实，“负气”的何止是先生一人呢？^①

六是他们敢于担当的使命感

自从儒家贤哲将“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之后，传统士大夫便责无旁贷地将家国天下的责任担系在了自己的身上，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迁延到近代现代，世逢千古未有之劫变，华北陆沉，中原报荡，三吴烽火，九夏蝥螭，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群体，民国时期的教授们，他们何以自处，何处以世呢？

历史学家陈衡哲曾对她的女儿任以都说：“我们那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当年青的女儿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时，陈衡哲对女儿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为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这真是一幅画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皮骨的自画像，尽管他们自画的方式各有不同。

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选择了以言干政的方式，试图在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一点一滴地改造这个政府，通过法治建设，最终将中国建成一个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国家，实现国家的富强。基于这种认识，胡适始终坚持站在国民党外（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当“过河卒子”乃是应国家之召，“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932年有关“人权问题”的论争，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都是他们这种政治理想的伸张。

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则由当初的以言干政走上了弃学从政的道路，试图通过“专家治国”的方式，以其政治热情和专业能力，实

^①原诗为“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竹门松菊家何在，且认他乡作故乡。”

现“好人政治”，更新国民党政权，达到强国的目的；而国民党方面呢，蒋介石一方面厉行党治，一方面在不触动基本政治结构的前提下，也变通地、有节度地对政治做了局部开放，让教授、专家在技术层面上的外交、经济和教育领域试了一把。据统计，在1933年国民党中央机关的12671名公务员中，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有1315名，占十分之一还强；在1935年底国民党的“人才内阁”中，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吴鼎昌任实业部长，王世杰任教育部长，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张嘉任铁道部长，蒋作宾任内政部长，教授们一时成了国民党行政院的主角。

冯友兰、熊十力等选择的是著书立说的方式，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的新支点，为民族自信和民族振兴输入精神源泉。抗战期间，冯友兰著述“贞元六书”，即是“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事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己”^①的结果。而熊十力的哲学一方面抗拒着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混乱——道德滑落、价值迷失、生命困惑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一方面又从改造、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构中国文化的民族重体，重树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和冯、熊等人相比，梁漱溟既是哲学家，又是实践家。从撰写《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到着手乡村建设运动，再到奔走国共和谈事业，他汲汲于途，劳碌奔波，所为何事？激荡在他心中的恐怕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的那份理想和担当意识。

也许后人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行事方式，也许今人会笑话他们过于书生意气，甚至迂腐犯傻，但哪个时代能抛弃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又有哪个时代能空乏直道而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精神呢？民国时期的教授们就洋溢着这样一种态度和精神，许是因为如此，历史才记住了他们吧！当然，周作人式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担当”，绝不同于他们的所为，就像今天的学人从政难以等同于丁文江们的所为一样，两者是不可放在一起言说的。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从最近的报上看到几条有关大学的新闻：

2006年8月初，中国人民大学耗资百万给三层高的食堂修建豪华观光电梯；

2006年10月初，聊城大学花八千万打造世界上最豪华的校门；

^①冯友兰：《新理学·自序》。

^②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见《读书》1987年第5期。

2006年10月14日,厦门大学宣布:两个月后,厦大将建成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练习球场;

2006年10月28日,北京大学透露:之前在北大校园东操场修建高尔夫练习球场的计划因争议太大已被叫停,何时恢复修建目前尚无定论。

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的大学是什么?“大楼”?“大师”?“大门”?大学的精神在哪里?时尚?高尔夫?呜呼,吾无言。

金岳霖：赤子其心，渊深其学

社会时代不同，政治气候不同，人的表现有时会大不相同，即使以气节相砥砺的传统知识分子也是如此。近现代易代之际，许多从伤痕累累的历史中爬出来的读书人，其解放前后的表现，竟然判若两人，纯净天真如金岳霖者，为了“思想上跟得上形势”，其自我批评与批评他人，常常令人有意想不到的激烈。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祖籍浙江诸暨，他于191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远赴美国求学，所学专业是几经选择才确定下来的。金岳霖是一个善长抽象思维的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成了他的最终决定，这让他和胡适、蒋梦麟、赵元任一样，成为杜威的四大中国弟子之一，时为1917年。三年后，他在哥大拿到了博士学位。当然，这个时候他的师兄胡适已“暴得大名”，海内闻知，蒋梦麟、赵元任也在北大和清华声誉鹊起。

金岳霖一生与清华大学结缘极深。自1926年他受赵元任引荐，创办清华哲学系，并任系主任后，一直在清华哲学系任教(西南联大时期称为哲学心理学系)，所教的课程包括“逻辑”、“知识论”、“哲学问题”等。或许是所学和所教的专业太富于哲理，多数人并不习惯于接受，因而人们了解金岳霖的，并非是他的学识，而是他的纯粹、天真与透明。

先看看他的形象。四十年代初，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文学院求学，三十多年后，已成为散文大家的他写道：“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仰着。他后来配了

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毛围巾。……他的眼神不太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这般装束，这种形象，想必也应该是西南联大的一道风景。

再谈谈他的讲课。汪曾祺回忆说：“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的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①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那时在哲学心理学系任助教，他回忆金岳霖讲课时的情景道：他常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使用，经常一堂课讲下来一个字也不写。”^②

逻辑学多为抽象的理论，比较“玄乎”，但金岳霖讲课很注意方法，“他把学生也看作是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听讲者有时感觉太深奥，其实，经过自己的研究，过一两天必非常清楚了。”^③另外，他还采取现场考查的方法，经常在下课前几分钟出一些联系实际的练习题，由学生当场作答，交卷评分。每学期练习十来次，平均成绩优秀则奖励免于期考。这种办法即时巩固了学生所学的知识，又有点激励机制，自然受到学生的欢迎。

二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金岳霖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如从政的有乔冠华、胡乔木等，治学的有沈有鼎、王浩等。沈有鼎是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王浩现居美国，国际知名学者，经常回国讲学。

此外，台湾自由主义斗士和著名学者殷海光受金岳霖教育和影响之后，更以其传人自居，毕生从事反对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斗争。殷海光原名殷福生，1938年入联大，后进清华研究院。关于金岳霖对他的影响，他在给其友人的信中写道：“在这样的氛围里（西南联大），

①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见《读书》1987年第5期。

②任继愈：《忆金先生一堂教学和两则轶事》，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清华人物志》，第122页。